**美国大选背后的价值冲突(下)**

**何怀宏**

**内容摘要：**本文上篇主要观察和分析美国早期历史中价值观的形成、组合，以及反映在《独立宣言》中的复杂性。下篇继续探讨了这些价值观念在独立之后又经历的演变，它主要表现为平等自由的扩展与幸福的物化。发展到当代，这些价值观念之间隐涵的矛盾也开始表现为比较明显和持续的冲突。这一冲突比较聚焦在独立自由与平等福利、以及传统信仰义务与个人选择自由之间。至于今后这种冲突会有何种走向，将不仅受到美国特殊情况，也将受到世界走向现代化潮流的影响。现代的基本标志有二：理性化与平等化，而美国在并未脱离这一主潮的同时，也保留了自己的一些“异类”特点，表现为一系列的悖论。

**关键词：** 价值观 平等 冲突 未来趋势

**作者：** 何怀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北京 100871）

**美国独立之后：平等自由的扩展与幸福的物化**

对《独立宣言》中楬橥的新的价值观念的反应是有些滞后的，当时的一个异议是将谴责英王的奴隶贸易的一段去掉。尽管杰弗逊、华盛顿等独立领袖们从理念上并不赞成奴隶制度，但为了尽量消除分歧，共同面对迫切的独立大计这样重大的政治问题，他们做出了让步。而对像“平等”、“自由”这样比较抽象的价值原则，当时参加大陆会议的人们反而不那么重视，但在后来的历史中，价值观念、尤其是载入开国经典文件的价值观念则显示出了它们的巨大力量，无论支持还是反对的人们不久都意识到了这一点。[[1]](#endnote-1)

1787年制定的《美国宪法》正文主要解决了国家何以成为一个真正有实力的国家、以及权力如何分配及互相制衡的问题。虽然只要权力受到制衡，就已经会有权利的相当空间了，但权利还必须直接得到保障，于是紧接着补入、后来且陆续有增补的权利修正案直接处理了公民个人平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问题。

比宪法更重要的是社会观念的改变，或者说法律和观念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而一个根本性的观念革命就在独立前后的半个世纪中差不多基本完成。戈登·伍德指出：1760年的时候，殖民地的200万居民仍旧理所当然地认为社会就是，也应该是等级制和从属制的。但在随后不到50年的时间里，这一共和制的国家已发展到近千万人且具有了平等的观念，“成了世界上最自由、最民主、最具经济头脑和最现代的人民。”[[2]](#endnote-2) 而这一社会变革的关键就是使美国独立并建立共和的革命。这场革命“也使后来的废除奴隶制和19世纪的妇女解放运动成为可能。”[[3]](#endnote-3) 它摧毁了贵族制度，普通民众有了受尊重的社会地位，原本卑下的劳作也获得了尊重，它还推动产生了全新的大众政治和一种新型的民主化官员，把人们对幸福的追求，变成了社会和政府的工作目标。它也释放了民众中几乎未被觉察的的巨大的经营企业和商业的能量，从而改变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形势。“总之，这场革命是美国历史上最激进、意义最深远的事件。”[[4]](#endnote-4)

美国革命不像法国革命那样激风暴雨而导致先是走向恐怖，然后是个人独裁，但它仍然是一场社会革命。就其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的结构而言，它不仅是一场革命，甚至是一场更成功、或者说真正成功了的革命。美国在摆脱欧洲的君主到建立共和之后，下一步就是走向民主了。其中平等的观念所发挥的作用至为关键。伍德写道，“平等的观念对人民能量的爆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平等的观念是美国革命中的产生的最激进和最强大的思想力量。它具有十分强大的感染力，这是革命者们没有认识到的。平等观念一旦被激发出来，就势不可挡，以惊人的力量在美国社会和文化中迅猛发展。它成为赫尔曼·麦尔维尔所说的‘伟大的上帝！民主的中心与外围！’” [[5]](#endnote-5) 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在形式和面貌上相当不同，它和法国革命也共享着一些根本的理念，甚至欲达到的目的也有不少共同之处。但是所采用的手段却相当不同，所呈现的面貌迥异，而最后达到的结果也相当不同。它是一场深刻的、但却似乎和风细雨的革命，然而，最后所达到，却几乎没有任何革命比它所获更多。

总之，1776年仍然是一个明显的标志线。如伍德所言，在独立革命之前，“人们很难想像一个文明社会除了是某种等级社会之外，它还会是什么别的类型的社会。”当时的人们“认为这种等级制度的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他们觉得生活在这个社会里，没有人是微不足道的，即便是最下等的仆人也不例外，他们由此获得了极大的精神上的满足，而这种满足足以弥补不平等造成的缺陷。在这个传统里，‘人各有其位，又休戚相关’。” [[6]](#endnote-6) 当然，他们也相信， 从一个等级向另一个等级的升迁不单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但是，要升迁的人必须具备和展示那个新的等级或地位所需的素质。革命之前和之后已经像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一个时代的观念以等级制度为“天经地义”；另一个时代的观念则以“平等”为“金科玉律”。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正确”。

这样，到19世纪初，原来的白人契约奴就基本销声匿迹。[[7]](#endnote-7) 而从20年代开始，杰克逊总统所带来的大众民主，则已经使覆盖几乎全体成年白人男子的政治参与权利基本得到落实，财产、地位、出身等因素不再成为限制。托克维尔1831年访问时所看到的美国就已经大致是一种大众民主的景象。而妇女的参政权也已经在各州逐渐入法，直到1920年在美国完全落实，载入宪法。

但是，对于平等自由来说，最重要，也是最棘手的问题还是黑人奴隶制度。而对于推动解决这一问题，信仰起了极大的作用。基督教唤醒了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观念：平等的主体应当包括所有人，而不只是一部分人，甚至它更关注那些贫困和弱势的人们，认为高贵者和富人比卑贱者和穷人更难进天堂。但是，直到中世纪，基督教社会的确也是更关注天堂、永恒和拯救而非尘世的问题，它将平等的主体扩展到所有人，但在平等的适用范围上，因为其时将此岸主要是看作奔赴彼岸的一段旅程，它并不着力于争取社会政治的平等，争取这种平等的普遍观念以及运动和革命要到近代以后才出现。而当持有这种平等精神信仰的人们将视线转向世俗社会，奴隶制度就会变得越来越不可忍受了。福格尔认为：“美国的反奴隶制运动首先是从宗教领域而不是从政治领域开始的。”[[8]](#endnote-8) 如果不是主要出于信仰和价值观念而是只考虑利益，很难出现居多数和强势地位的白人为居人口少数和弱势地位的黑人呼吁、呐喊、乃至最后浴血奋战的情况。

那些仍然想维护这种制度的人们，比较直接的理由看来是以州权来抗衡，这是南方的州想从联邦争取独立，有的理由和当年殖民地从英国争取独立也有类似之处，他们也想维护他们自己已经习惯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但这样的方式却建立在另一些人被奴役的基础上。这样，我们看到固有的信仰与独立的价值观念也就已经有了一些裂痕和冲突。当然，从深处来说，南方人还提出了一些更多的价值理由。卡尔霍恩1837年2月6日在国会“关于废奴请愿书的演说”中认为南方蓄奴制从双方看都并没有损害到人，即奴隶们并没有处境悲惨，而主人们也没有道德堕落。 还留在非洲故乡的黑人“都不曾像（美国）南方黑人那样，达到此等的文明和舒适程度，无论是从物质角度看还是从道德和理智角度看，都是如此。”“与此同时，白人或者欧洲人也并未因此堕落下去。”“南方的白人在德行、理智、爱国精神、勇气、超脱以及那些装点了人类本性的重大品行方面，与北方的白人相比，并没有任何逊色之处。”他认为北方作者对南方黑人的描述是不真实的，奴隶们其实被留下了很大的一块物质财富的份额，从生老病死都得到悉心的关怀和照顾。[[9]](#endnote-9) 但无论卡尔霍恩怎样辩护，奴隶制在道德上的不正当，尤其是不可能见容于现代社会是明显的。就像福格尔所说的：“反对奴隶制的人们认为，无论奴隶主对待奴隶如何，奴隶制本身都是一种罪恶。”[[10]](#endnote-10) 这是一个历史的沉重负担和现代的最大不义，人们忍受这个负担和不义也已经够久了。

总之，1863年的废除奴隶制度，解放黑人，这看起来只是自由主体的平等扩展，但对整个国家来说，正如林肯总统所言是“自由的新生”。处在现代世界的美国不再会像古代的雅典、罗马那样对一部分人自由，另一部分人被奴役（那怕他们是少数）的社会状况视若无睹，安之若素， 这是基督教和启蒙运动的双重结果。“所有人都被创造为是平等的”，而且，这不再只是精神的平等，而且是实质的社会平等；不再只是彼岸的平等，而且是此岸的平等。奴隶制度若不废除，它就将是美国的一道永远流血的伤口，是面对现代世界的一个巨大羞耻。

但是，黑人从奴隶身份的解放并没有使他们获得真正广泛平等的社会和法律地位，而贫困的人们即便有19世纪末的进步主义运动所带来的改善，也一直没有得到国家制度和政策的根本性保障，对不同种族的移民也有歧视性的政策。直到1929年经济大萧条发生，许多人堕入靠自身难于解决的穷困之中，这才引起了比较根本性的变化。为了应对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面，罗斯福“新政”开始的社会福利政策广泛惠及了下层民众，同时也大大扩展了联邦国家的权力，包括重新解释了“自由”的概念，使后来的“自由派”和“保守派”开始成形。

6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通过反对南方的种族隔离，使黑人的社会地位大大提升，也普遍提升了少数族裔应受同等尊重和关怀的地位。而与反对越战大致平行的学生运动则大大扩展了个人的选择自由，年青人试图突破所有的禁忌和界限，探索似乎无穷的自由的可能性、乃至于包括性交、毒品和反抗的暴力的自由。而反对的力量，保守主义和传统信仰的思潮也在此时开始上升，“沉默的多数”开始用选票“发声”，且在八十年代迎来了里根、老布什的连续执政，自由世界几乎是“不战而胜”，乃至到克林顿时期，在经济政策方面也还是沿袭了相对中间甚至偏右的路线。左翼的激进运动受挫，学生们回到重新安静的校园，但许多左翼的思想观念，尤其是弱势的个人和群体的选择自由、平等福利的观念大为流行，越来越在知识界和媒体界占据主流。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潮流携冷战结束的声势也依旧强劲，宗教开始了被称之为“第四次大觉醒”的复兴。也许还是先在观念上，然后再在行动和政策上，左右两翼对峙、互不相让的局面开始形成。

在这两百多年间，平等观念的普及化、全面化及其在社会层面上的不断进一步落实，这是主要的潮流，而伴随的还有幸福观念的物化，过去的幸福观念的精神层面的因素总体来说是趋于淡化了。

伍德也描述了这一潮流的滥觞，他认为美国人在独立战争之后五十年对幸福的理解日益倾向物质化的根本性变革，和大众民主大致是同步的。美国人在抛弃对君主制的效忠之后，需要寻找一种新的社会纽带和基础，最终他们在普通百姓的实际行为，在他们每日渴望挣钱的自由，渴望去追求现时的幸福的举动中，找到了新型的民主黏合剂。[[11]](#endnote-11) 美国革命的第一代领袖们难于阻止人们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去实现自己所理解的“幸福”——这可能主要是物质利益。而他们试图采取的法律手段看来最后反足以保障和引导了人民的致富和平等意愿；当然，它们也使这种意愿进入了一个也是比较平稳和健全的发展轨道。“到了19世纪初，美国已经开始变成西方历史上最平等、最实利主义、最个人主义的社会，……这个新型的民主社会在许多方面同革命领导人曾经设想的社会恰恰相反。”[[12]](#endnote-12) 许多建国领袖不免失望，但大多数美国人却欢欣鼓舞。

在“杰克逊民主”时期来到美国考察的托克维尔也描述了这一情景。他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专门有一节写到了“关于美国人对物质福利的爱好”，他谈到在美国，对于物质福利的热爱并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虽然不是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去热爱，但至少人人都有这种热爱。他认为这种追求物质享乐的激情，本质上是中产阶级的激情。这种激情正是从中产阶级向社会的上层和一般老百姓扩散的。喜爱物质生活的享乐，正在变成全国性的和居于统治地位的爱好。人心所向的这股巨流，正把所有的人卷进它的狂涛。当然，托克维尔也指出，他们也主要是应用他们的自由，通过自力去追求财富和享乐。他说：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国家能象美国那样很少有游手好闲的人。在美国，凡是有劳动能力的人，都热火朝天地去追求财富。而他还注意到美国人在热烈追求物质财富的同时，也还是有一种与宗教精神的微妙平衡。至少在礼拜日，全国的工商业活动都好象完全停顿，人们来到教堂，进入了一种庄严的凝思时刻，灵魂也开始自我反省。他们从教堂回到家里，也并不去看他们的商业帐簿，而是要打开《圣经》，进行祷告。物质与精神在这种演变的幸福价值观中还是保持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宗教精神虽然淡化，但不时还是有强烈的反弹，甚至依然能够产生影响巨大的社会运动。

**当前的冲突**

价值观念是一个复数。不仅在社会那里，甚至在个人那里也是如此。人们追求的价值往往差异甚大，当然，在一些社会和个人那里，这些价值观念可以组合为一个高低有序的价值系统，有一个统摄或者支配性的价值观念，比如在中世纪欧洲社会，基督教信仰就是这样一个支配性的价值观念，甚至“幸福”也可以是世俗社会、现代多元社会的一个统摄性的概念，虽然有些人可能不愿意用“幸福”这个概念来概括，或者即便用它来概括，对它也有差异甚大的理解，但这时还是可能出现自然而然的出现对幸福的主流理解。

既然价值观念是一个复数，它们就有歧异和冲突的可能，至少会产生一些不能兼得的情况下先满足那些，后满足那些，或者更多地满足那些价值的情况。当今美国社会的主要价值观念看来就陷入了一种不仅歧异，而且冲突的困境。那么，是那些价值发生了冲突呢？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冲突呢？或者说，为什么以前这些价值观念可以协调，现在却难以协调呢？

在我看来，按照先前对《独立宣言》所做的概括，当前的价值冲突主要发生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独立自由与平等福利之间；一是在传统信仰义务与个人选择自由之间。[[13]](#endnote-13)

赞成以独立为核心的自由的一派，认为摆脱贫困、进而过一种“体面的生活”，乃至发财致富应当主要是自己的责任，而扩大政府的权力将损害到个人的经济自由，所以，他们在政治上主张小政府，赞成减税，反对在他们看来超出了救助那些真正需要救助的人们的范围（在他们看来这些人今天只会是很少数）[[14]](#endnote-14)，却侵犯到他们的经济自由的国家福利政策，反对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也享受本国的福利。而更加赞成平等福利的人们，则主张只有尽量缩小贫富差距，才能真正实现自由，体现公平的正义，所以，在政治上赞成向富人征收高税，扩大和推进国家的福利政策，包括在一段时间里推进弥补性的对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的照顾和优待，赞成接纳移民，因为正是移民创造了这个国家，且不说还应当有博爱与同情心。

另一类冲突是发生在传统信仰义务与个人选择自由之间。赞成传统信仰义务的人们认为传统的宗教信仰——主要是西方基督教信仰——是个人安身之基，也是立国之本，必须在社会甚至政治生活中给予重要的地位，个人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义务，也要尊重大多数人的感受，所以，他们赞成恢复学校祷告，注重政治人物的信仰，重视家庭，支持将英语立法为官方语言，反对堕胎，反对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反对色情公开化和大麻合法化。他们看来也更热爱自己的国家，甚至有孤立主义的倾向。[[15]](#endnote-15) 而赞成个人选择自由的人们则认为个人生活只要在没有对他人与社会构成伤害的情况下，就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任何事情，这包括个人的性取向，对婚姻的看法和对宗教的态度等等。而且，社会还应该特别关注、尊重那些处于弱势的人们，例如女性、少数族裔，同性恋等等，认为这样才能体现平等的尊重和承认。他们也更倾向于向世界开放，赞成全球化。

以上两类冲突中，赞成前者的人们一般是支持共和党，被称作“保守派”；而赞成后者的人们一般是支持民主党，被称作“自由派”。当然，落实到具体的人们，对上述价值观念及政策的认可会是程度不等的，尤其是，双方在这两类冲突中的支持者不一定是完全重合的，[[16]](#endnote-16) 即除了两方面都赞成的人们，还有只赞成其中一个方面的人们，他们只能根据对自己价值观念那一方面更为重视，而在两个大党之间进行选择。[[17]](#endnote-17)

为了比较起见，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第三大党”即“自由至上党”（Libertarian Party）为例，[[18]](#endnote-18) 这个党的成员大致持这样一种观点：他们赞成小政府和经济自由，但并不赞成个人受传统信仰义务的约束，而主张个人选择自己生活的全面和彻底的自由，认为这才是逻辑一致的。[[19]](#endnote-19)

这样就构成了这样一个自由主义的政治谱系：共和党（独立自由与传统信义）——自由至上党（独立自由与选择自由）——民主党（平等福利与选择自由）。似乎并没有一个主张结合“平等福利与传统信义”的政党，那也就可能超出自由主义的范畴了。共和党被视作自由主义的右翼，民主党被视作自由主义的左翼。[[20]](#endnote-20) 在政治斗争中对自由民主、宪政和法治的认可或者说对暴力和极端手段的拒绝使它们区别于更左或更右的两极。

如果在这一并不脱离自由主义的意义上称支持共和党的人们为“保守派”倒不算离谱，因为他们保守自由——比较古典的自由；也保守传统——主要是基督教的传统。虽然他们在几十年前也不愿接受这一称号。[[21]](#endnote-21) 但称支持民主党的人们为“自由派”却不很确切，更恰当的名称或许应该称他们是自由主义中的“进步派”，他们的确也继承了美国进步主义的传统，而且在不断推进对自由平等的新理解，他们也相信乃至崇尚进步，而“进步派”的名称也和“保守派”的名称能够构成对应。但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开始，“自由”已经发生了一种转义，他也更愿意称自己的新政为自由派而非进步主义的，一个原因是大多数美国人一贯将自由视作头等重要的价值。由于美国现在的“自由派”和“保守派”这两个概念已经约定俗成，不好更改，我们大概也只能意会而非言定了。

我们还可以更为通俗，也更为激烈而鲜明地表达这样两种价值观如下：[[22]](#endnote-22)

支持独立自由与传统信义的一派大致会说：人们应该独立地去争取自己的幸福，而不是依赖他人，坐享现成，为什么一个努力工作的人，交过税后的所得会与一个什么工作都不做的人所得相差无几？为什么53%纳税的人们要养活那些不纳税的人们，即几乎是一半养活另一半？为什么要允许那么多经济移民、甚至非法移民轻易地就享受各种福利，而更让人担心的是还有那些并不认同我们的价值观的人还可能带来恐怖主义的危险？[[23]](#endnote-23) 你们只是要均分财富，却从来不问这些财富是怎么来的？它们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们形成，必有人为之付出劳作、智慧和汗水。一个繁荣富足的社会，一个伟大的国家，必须是有许多的人为之不断做出贡献，可你们却轻视这一伟大的传统，甚至自我贬损。你们也不能体验一个自我致富甚至只是自食其力的人的自豪，甚至剥夺这种自豪。还有，为什么那么多反映了事实的话却要在“政治正确”面前变成不能说的禁忌？你们难道没有想过，当你们说你们口口声声说要尊重少数人的选择自由的时候，却在压制大多数人的自由，完全不顾他们的感受？

支持平等福利与选择自由的一派大概会说：为什么占1%的人们却可以获得几乎占私分之一的人们那样多的收入？乃至拥有更大比重的财富？为什么一个CEO能够得到比其他人多几百倍的薪水？一个人的收入就可以超过成千上万工人的收入？他们真的创造了那么多价值吗？更不要说世界上还有许多人，甚至国内还有人还在贫困线上挣扎，如此强烈的贫富对比难道不让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们感到触目惊心？[[24]](#endnote-24) 我们不给所有人一定的福利，不给那些处在不利处境中的人们创造条件，她（他）们怎么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平等？为什么要反对移民？美国就是一个移民创造的国家。我们都曾经是移民，何况世界上还有许多流离失所的难民？ 至于像少数一直受压制的同性恋者等弱势群体，难道我们不应当体会到他们的处境和感受，给予他们同样的认可和尊重？我们不是应该净化我们的言语和社会气氛，防止一切带来歧视甚至仇视的东西？我们难道不应当努力去争取一个人人平等自由的社会，乃至一个幸福和谐的世界？

为了理解当前冲突的起源，我们这里可能需要稍稍再作一点历史的追溯：我们可以在八十年前就看到这种冲突的起源，在五十年前就看到这种冲突的登场，在新的世纪则看到这种冲突的激化。

在1929年发生的大萧条之前，美国曾有过数十年经济快速发展的好时光，它也开始在一战期间强势地走向了世界舞台。但当金融危机袭来的时候，也明显地暴露出它的弱点：经济尤其金融活动缺少必要的、预先有防范的监管，没有普遍的纾危解困的福利政策。那时的风尚是人们多认为贫穷是自己的过错，因而是可耻的，不愿意暴露，也不愿意申请社会的救济，而即便申请，也有许多手续的不便和资格的限制，得到批准也很难，因为地方政府也有许多财政上破产了。美国虽然一直有主要靠私人慈善机构和半公共福利团体来关照那些贫困中的鳏寡孤独的人们的传统。[[25]](#endnote-25) 但大萧条使得慈善机构的负担加倍，也差不多穷尽了所有的捐款。

罗斯福新政时期快速通过了一系列救助法案，大大地帮助了人们从经济危机的困境中走出来。[[26]](#endnote-26) 一些福利政策和机构也就长久地固定下来了。但这些措施也大大增加了政府的权力。权力在拿到权力的机构和个人那里总是不会轻易松手的——那怕这只是出于一种惯性而非对权力的欲望。在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艾森豪威尔试图超越意识形态的争论，基本上延续了新政的政策。

重要的转折可能是发生在1964年，在民权运动的推动下，约翰逊总统提出了“伟大社会”和“向贫困开战”的宏伟计划，他在一次讲演中阐述了新的目标：“仅仅打开机会之门是不够的，我们全体公民必须有能力跨过大门。这就是民权斗争的下一个更深刻的阶段。我们不仅追求自由，而且追求机会。我们不仅追求法律公平，而且追求人的能力，不仅追求作为权利和理论的平等，而且追求作为事实和结果的平等。”[[27]](#endnote-27) 也就是说，不仅要政治和法律领域内的平等、还要有经济和教育领域内的机会平等；不仅要有这些领域内的机会平等，还要有事实和结果的平等。约翰逊推动当时民主党占优势的国会通过了近百项有关民权、反歧视、福利政策和扶持行动的法案。而在1964年的总统大选，他以很大的优势战胜了共和党的竞选者戈德华特。戈德华特竞选总统虽然惨败，他却鲜明而激烈地提出了一系列反对新政的保守主义主张，而且在党内初选中击败了党内自由派候选人洛克菲勒，这说明了美国国内已经开始有了一种对持续新政的强烈反弹。不妥协的保守主义也浮出了水面。

这是一条平等福利的线索。另一条线索则是个人的选择自由。约翰逊执政时期不久就越来越深地陷入了越南战争的泥潭，而反战的学生运动也开始兴起，而这场运动同时还是一场激烈反对传统文化和信仰、反对各种权威和约束的运动。“不要相信任何三十岁以上的人！”是当时的一个口号。他们占领大学办公楼，烧毁兵役证，生活上放荡不羁，纵情享受，尝试性解放和毒品等各种各样刺激的、新鲜的生活方式。[[28]](#endnote-28) 尼克松的竞选开始强调法律与秩序，诉诸“沉默的大多数”，但在他的执政期间，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体面地结束”越南战争，在国内政策上并没有特别地压抑平等福利和缩减政府开支，但其为共和党争取南方的战略基本成功。

在某种意义上，里根执政的80年代是对前面的6、70年代的真正大幅度反弹——既是对民主党执政期间大规模福利政策的反弹，也是对越战期间盛行的青年反叛运动和纵欲文化的反弹。他在国外强硬应对各种对美国和自由世界的挑战，在国内反对大政府和个人放任，在这两个方面都比较彻底地实践了保守主义的主张。保守派在里根时代重新崛起，不仅在社会上获得巨大影响力，在政治权力上也收获了一个黄金时期。进入90年代，虽然大部分时间是民主党的克林顿执政，但他在经济上还是相当多地延续了里根时期的许多刺激经济的政策。两派的冲突还没有到持续紧张的阶段。

进入21世纪，这种冲突则趋于激化和难于释解。小布什执政期间遇到911事件，他发动了一系列反恐战争，其正当性遭到质疑。在经济和教育方面，他虽然主张减税，但政府开支还是较大，而他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对信仰的虔诚，赢得了社会保守主义者的坚定支持。如果没有经济自由主义与社会保守主义的结盟，共和党是难于取得总统大选的胜利的，后者的动员力和战斗力相当强悍。当然，它也因此丢掉了一些崇尚个人自由的知识和技术精英较多的地带如加州。后来的奥巴马总统给人们带来了最多的改变的希望，他在平等福利与个人选择自由方面均有所推动，通过了奥巴马医改法案，高等法院通过同性婚姻合法的裁定，但其许多改革也受到国会的制约。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地位在这五十多年间发生了一个奇妙的位移甚至反转，原来代表东西两端濒海地带、教育技术更为先进和开放地区（当然也是少数族裔较多的地区）的共和党，却开始转而以中南部为根据地了；而原本得到南方支持的民主党则基本失去了南方，但是得到了东西部发达地区的支持。

在上面所述的这八十多年中，民主党执政48年，共和党执政36年。平等在继续进展，联邦权力在继续扩大，最高法院似乎也更积极地介入了社会政治，两党在国会互有消长，双方以党划线，互不妥协，包括与行政权力的党派对峙也更不相让。包括撇开体制精英，发生比较趋于极端的社会运动，而这些运动又对体制内的政治精英也构成了压力。如果说总的趋势，平等福利和选择自由的一派看来还是处于攻势，或者说“不断进步”，而独立自由与传统信义的一派是处于守势。但有时后者反击的力度也相当的大，甚至采取比较极端和戏剧化的形式。当平等只是处在平等生存和平等自由的范围的时候，独立自由一派并没有那样反抗，甚至合力支持。但是，当平等扩展到福利的领域内，他们会认为这侵犯到了他们的经济自由，而当平等尊重采取一种日趋扩大和严格的“政治正确”的形式时，他们会认为侵犯到了他们的感情和言论自由。

双方的价值追求均有自己的合理性根据，迄今的许多进展，比如说目前在美国社会各行各业，包括政府机构普遍看到的对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的文质彬彬的尊重与服务也是让人赞许的，且不能不说主要是左翼之功。但是，鉴于平等福利和个人选择自由在不断地扩展，“度”或“平衡”的概念也许纳入考虑，故而后面可能会更多地要说到平等福利和选择自由“过度”的危险。

《独立宣言》中所揭示的六种基本价值存在着相当多的可以调协一致、达成共识的因素：比如说人们可以同时追求这六种价值，它们有许多的相通之处，尤其是作为基本标尺的**平等**。平等就意味着某种普遍性，一种必须将他人视作在某种意义上是与自己同等的“金规”或“忠恕”，所有的具体主体均可以互换。其他价值一旦涉及到普遍性和真实性，都必须在某种程度或范围内是平等的：比如如生存权，就意味着所有人都同样具有某种生存权；自由权也是一样，意味着所有人都具有自由权，否则就不能算拥有这种权利。权利都必须具有某种普遍性才具有真实性。所以，在某些领域，比如说在政治领域内的基本自由，追求自由和追求平等其实是一回事。两者可以、且必须同时存在。我们谈自由其实也是在谈平等，谈平等其实也是在谈自由。或者说，我们对政治领域更多的是说“自由”或“基本权利”，因为“平等”有时会有一个较狭的用法，专指经济领域。

平等的主体应当指所有社会成员、所有人可以说是现代平等应有之义。而平等的应用范围则可以说展现为三个递进的领域：第一是平等生存，这甚至可以说是所有政治社会、包括传统与现代国家的共识，即任何比较正常、能够长期延续的国家都要对所有社会成员的人身安全与基本生活资料给出起码的保障；第二是平等自由，这可以说是现代政治社会的共识，即现代国家应当给所有社会成员以良心、言论和政治的基本自由，但有些个人选择自由是否是基本自由，是否应当纳入国家的保障还有争议；第三是平等福利，即经济收入的领域，物质生活与财富的领域，在这个问题上就争议比较大了，甚至可以说产生了尖锐的冲突，现代民主社会的主要趋势可以说是提升平等福利的，但提升到什么程度仍然争议很大。而今天的一些自由派人士可以说比当时激进的《独立宣言》更激进了。他们不满足于只是保障所有人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而是还想直接地确保所有人的幸福，或至少是幸福的外在条件。这表现在追求平等福利、结果平等，以及平等尊重对少数和弱势群体幸福的保障。[[29]](#endnote-29)

当良心、信仰和表达的平等、经济的机会平等和政治参与权利的平等（这些平等实际和自由是一回事）都获得之后，还要不要将平等继续推广到经济福利的方面，以保证每一个人都得到实质性的幸福，或至少得到幸福的充分的物质条件方面的保障？理想的状态看来应该是这样的，但这就意味着要更关怀或者说更偏爱弱势者，给他们更多的福利，而这就也将影响到他人的收入和经济活动的自由，侵犯到一视同仁的平等，在此平等与自由就要发生冲突了，或者说平等本身就要发生冲突了，正是在这个领域，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起点平等与终点平等的区分就有意义了，常常就必须两者择一而不能兼顾。这样就出现了两端：独立自由的一端和平等福利的一端，本来在政治和法律权利的领域两者的一致，到了经济和个人选择的领域就分离和破裂了，当然，这也可以说归根结底是自由与平等的矛盾，因为前者更强调自由，认为自由的本义就是独立；而后者更强调平等，认为平等必然要走向实质的平等。

和权利与机会的平等不同，要推行事实和结果的平等，必然要深入到经济和利益的领域，必然兼顾不了机会的平等，甚至要造成另一种不平等，另一种歧视（对一些人的偏爱必然是对另一些人的忽视甚至歧视），两者是有无法协调的矛盾的，这里的一个分析例证是教育和就业方面的“肯定行动”（Affirmative Action,或译作“扶持政策”、“平权行动”），比如说如果要扶持非洲族裔，对他们进行加分或用定额制等其他措施使她（他）能够进入大学，那么，在名额有限的情况下，就必然使一些其他成绩和她（他）们一样或更高的其他族裔考生不能进入同样的大学。而如果这些被优待进入大学的学生有相当一个比重因为课业成绩差不能毕业。是不是要在课业成绩乃至之后的就业方面继续优待他们以让他们毕业，并且优先录用以让他们占据职业领域的一个与人口相应的比例呢？如果这个理由成立，是不是有人也会要求在名利巨大的NBA（全美职业篮球联盟）给同样是在这个项目上的弱势群体和少数族裔的亚裔以优待呢？在这个项目上为什么不保障多样性或者实行补偿的正义呢（华工在美国历史上不也受过很不公正的对待）？这里不是要褒贬什么，只是想指出在这样的实质利益方面的分配，是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两者不可兼得的。所以，即便是支持肯定行动的许多人，也还是认为这只是一个在一段时间内才需要采取的措施。

一个享用了政治自由的人（比如说投票）也可以说他也获得了政治平等，他既得到了权利也履行了义务。但一个依靠福利生活的人却无法说他也是一个和他人一样平等的纳税者。因为在经济领域分配的不再是权利，而是分配物质和实利。一个享有平等选举权利的人即便他不去投票，也不会说损害了其他享有他人的权利，但物质利益的分配必然要在一定的数额中分配：一方的所得即另一方的所失。一个政府可以同时推进政治平等与政治自由，但它却无法同时推动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起点平等与事实平等。它要达到事实和结果的平等，必须对一部分人表现出偏爱或给予优待，把一部分人的机会或收入转让给另一部分人。而且，如果要盯着最富有的人们，不断提升人们的物质期望，这数额会总是不够的。人们会永远都感到匮乏，或者总是觉得相对被剥夺。

当然，涉及到物质资料数额的方面还有一个是生存。一个社会要保障所有人的平等生存，就必须给那怕是不能劳动者也提供必要的物质生存资料，而且一个好的社会还应该提升这“必要”的标准，不仅仅是让所有人都能动物般地勉强活下去，而且给所有人都提供一种人之为人的，像样或“体面的生活”。但这的确又不是“均富”，或者说是这样的“均富”——即所有人均比较富裕，但并不是完全均等的富裕。

平等福利看来越来越成为当今美国一种主要的“追求性价值“，而信仰与独立则成了一种”珍视性价值“，问题在于这些“珍视性价值”也是一种“动力性价值”，而平等福利则是一种“享用性价值”。如果“使美国富”的因素不断减弱，而“靠美国富”的因素不断加强，再富裕的社会也总有一天会难以为继。

诚如上述，还有一个重要的争议方面是有关传统信仰义务与个人选择自由，但这种选择自由又可以说是在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展开的，它要求一种平等的尊重，或者说要求一种“承认的政治”。即它已经不仅仅涉及到私域，也涉及到公域。它们都对政治有要求。一些保守派人士希望政府给某一宗教以某种特殊地位，但这可能侵犯到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的原则，影响到其他宗教、信仰甚至包括社会主流宗教自身的发展。一些自由派人士希望给予一些边缘和弱势群体的特殊自由权利以政治和法律的承认，但现在争取的这些自由可能已经不是基本的自由，也不是所有人的自由，而往往只是一部分人的自由，但它却期望通过法律得到所有人的承认甚至尊重。

在这方面我也想举一个可能比较极端的例子来说明有些价值冲突的无法兼顾。2016年5月奥巴马总统发布了一个政令，要求学校允许学生按照自己的性取向而非生理特征选择厕所，我们可以考虑有些学生的确是有和自己的生理特征不一样的性取向，这样他（她）在上与其生理特征相符的厕所时会感到不快甚至痛苦，但是，我们是否也要考虑，如果他（她）可以自由选择上相反性征的厕所，会不会造成比这多得多的学生也会感到不快、混乱甚至惊恐呢？像个人的性取向等如果仅仅是在私域中发生作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其他人应当予以宽容。问题在于这样的事情还可能要进入公域，会要求他人的承认和尊重，甚至是通过立法的形式来要求他人的承认和尊重，那么就可能发生问题，就有许多人会不愿意接受。在这样两种互相排斥的感受之间就无法兼顾，我们就只能两者择一。

我们看到，独立自由与平等福利的冲突主要是经济领域，或者说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关系的问题，保守派认为在经济领域中保障自由是最重要的，政府应该尽量不干预经济活动，尽量减少开支，对企业与个人减税；而自由派则认为政府应当承担经济利益再分配功能，在社会实现某种福利平等。传统信仰义务与个人选择自由的冲突则主要是私人领域、或者说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关系问题，保守派要求将某些传统的个人信仰扩展和至少保持一种政治地位；而自由派则主张政治社会应当接受或尊重某些边缘和弱势群体的选择自由。由此它们都进入了一个双方要求很难兼顾的境地，在某种意义上就难于避免冲突。当然，虽然不可能完全协调，寻求某种折中妥协，平衡的度还是有可能的。

**未来的趋势**

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还未结束之前，就曾有人说：“忘掉特朗普吧，未来是桑德斯的”。支持桑德斯的年青人据说超过了支持特朗普与希拉里的年青人的总和。在民主社会主义者桑德斯面前，连希拉里也显得保守了。许多年青人在桑德斯还没出来初选之前支持希拉里，等桑德斯出来之后就马上转而支持桑德斯了。而未来不是属于年青人的吗？

但这次大选的结果颇有些让人意外。不仅特朗普当选了美国总统，当选的共和党人州长也超过民主党人州长不少，共和党也仍在国会两院中保持多数，而总统还握有最高法官的提名权。美国高层政治今后几年似乎要向右转了，但这是暂时的还是持久的？是右派营垒的最后一博还是向右大转折的开始？

《右派国家》的作者、《经济学人》总编米克尔斯韦特和驻华盛顿站主任伍尔德里奇似乎认为美国的未来更多地掌握在共和党的手里，因为它代表着企业家而非政府雇员；代表着不断增长的郊区而非正在衰落的市中心区；代表着不断扩展的西南部而非停滞不前的东北部。[[30]](#endnote-30)

欧洲最近的变化似乎也在支持西方右转的论据：英国公决脱欧，意大利、法国、奥地利等国的右翼政治力量看来正在崛起，甚至有赢得大选的可能。但这右转是否只是一股暂时的“逆流”？世界的大潮无疑还是将继续走向平等化和全球化？

反对的人们则指出美国未来长期不可能右转的几点论据：美国的来自拉美等国的移民越来越多，而移民是较多地支持民主党的；[[31]](#endnote-31) 年青人也是更多地支持左翼的，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青人，教育和媒体也更多地掌握在偏左的力量手里；科技和知识精英也大都支持左翼，支持左翼的“蓝色地带”都是高科技发达的进步地区。

两种观点比较，从长远来看，后者看来是更有道理的。而且，看长期的趋势，可能更重要的还是要看深层的价值观，且不仅要看美国，看西方，还要看整个时代和世界。

我认为平等化与理性化是现代的两个基本标志。对平等化，托克维尔给了最清晰的观察和阐述，对理性化，韦伯给了最全面的分析和论述。而且，两人的深邃之处还在于他们各自都并不是一味接受和肯定这一趋势，而是对理性化与平等化的问题和界限有深刻的反省。平等化释放了巨大的物质动机欲望，理性化提供了日新月异的技术手段，加上全球市场，遂创造了技术发明和经济发展的奇迹。到今天，人类一年所创造的物质生活资料总值，或就已超过农业时代数百年、采集狩猎时代数万年人类才能创造的总值。

韦伯在分析资本主义精神和新教伦理与托克维尔在阐述民主和平等的论著中，都曾以美国为例证。韦伯在阐述资本主义精神的时候，以富兰克林的《穷理查箴言》为范例。他认为，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一种新教的“天职”或“呼召”（calling），一种要以尘世的成功和经济的成就响应这种呼召，配得上帝的荣耀，成为最初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巨大动力。但是，他也认为，虽然富兰克林话语的内容与清教世俗禁欲主义的内涵并无二致，“只不过它已没有宗教的基础，因为在富兰克林的时期，宗教基础已经腐朽死亡了。”即动力的基础已经由宗教的精神变为纯粹的物欲。至于美国建国之后的历史则更是如此，在资本主义精神“获得最高发展的地方——美国，财富的追求已被剥除了其原有的宗教和伦理涵义，而趋于和纯粹世俗的情欲相关联，事实上这正是使其常常具有体育竞争之特征的原因所在。” [[32]](#endnote-32)

在富兰克林时期，更不要说以后的时期，人们的工作伦理动机中的宗教意味和分量自然不能和欧洲资本主义刚刚兴起的更早时代相比，但是韦伯断言在那个时期宗教基础就“已经腐朽死亡”可能还是言之过甚，或者说至少忽略了美国比欧洲可能还更顽强地保留了宗教信仰的初心。不像欧洲，美国的宗教精神还是有一次次的强烈反弹，直到今天，它还是西方民族中最具有宗教性的。

以下是韦伯对这个名为“现代“的时代的未来所悲观预测的名言，那也是这个试图严守学术“价值中立”的学者在书的结尾中稍稍暴露的价值评判: 机器生产的技术和经济条件今天“正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决定着降生于这一机制之中的每一个人的生活……也许这种决定性作用会一直持续到人类烧光最后一吨煤为止。” “身外之物”本来只应是基督教作家巴克斯特所认为的圣徒们“肩上的一件随时可以甩掉的轻飘飘的斗篷”。“然而，命运却注定这斗篷将变成一只铁的牢笼”。可以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33]](#endnote-33)

其最后一句话尤其精彩而沉重，当这一文化自以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自然是物质和技术文明——的时候，它却可能完全丧失了精神，没有了“灵魂”和“心肝”，韦伯甚至用“废物”这一严厉的词来指称这一文化。

韦伯对未来的确相当悲观，他承认专业化的工作，弃绝它所牵涉的浮士德式的人类共性，是现代社会中任何有价值的工作得以进行的条件，但这“同时意味着一种绝弃，一种与追求完整的和美的人性的时代的分离；在我们的文化发展进程中，与雅典古典文化的兴盛时期同样，已不再有可能重现那个时代了，就象古雅典文化的兴盛不会再现一样。”

但是，韦伯在此并没有解释为什么情况会变成这样？为什么会有这种动机从宗教精神到世俗物欲的大转变？为什么圣徒的“斗篷”将变成社会的“铁笼”？为什么物欲将可能笼罩一切，乃至到最后的能源耗光为止？我想我们或许可以从托克维尔对世界平等化潮流的观察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性的分析中找到一些答案。

托克维尔认为，平等的逐渐向前发展既是人类历史的过去又是人类历史的未来，甚至具有一种神启的性质。平等也许并不怎么崇高，但它却是非常正义的。现代的各国将不再可能在国内维持不平等了。平等不可能止步不前，只限于一个领域。甚至反对的力量最终客观上也还是推动了它——它更加刺激了人们对平等的追求。他还提供了一种平等为什么不会止步不前的一种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解释：当不平等是社会的通则时，最显眼的不平等也不会被人注意；而当所有人都处于几乎相等的水平时，最小一点不平等也会使人难以容忍。因此，人们越是平等，平等的愿望就越是难以满足。但托克维尔的确又还是有一种忧心，他忧心的是平等的过度和幸福观念的过分物化，忧心过度的平等对其他价值、比如自由、独立、繁荣和幸福可能造成的损害。所以，他说，平等将导致奴役还是导致自由，导致文明还是导致野蛮，导致繁荣还是导致贫困，这就全要靠各国自己了。[[34]](#endnote-34)

走向平等也就是走向多数支配，这包括价值观念上的多数主导。价值的多元平等将自然而然地会形成以多数人追求的价值为依归，为主流的一元。如果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诸多长篇小说中提出的疑问和解释，多数人将会更愿意追求物质而并非精神。现代社会的平等化，将释放在传统社会中可能开始只被少数人信奉、但却渐渐居于社会主导地位的价值观所压抑的物质追求，[[35]](#endnote-35) 使之成为不再受到拘束的强大动力，乃至所有的政治精英和技术精英都要趋奉于它。而现代社会的理性化则将“祛魅”，淡化乃至除去对精神信仰的追求，而这一现代社会的理性本身也将越来越工具化和手段化。两者结合，固然能够造成经济和技术的奇迹，而也可能永久地丢失对精神的追求，或者只是很少数人在边缘地带默默地保持这种追求。

这样，我们或许就可以说，从世界的潮流来看，从人数的多寡来看，对平等福利的追求就必然还会是未来的主流，是大趋势，而反对这一追求的可能处在比较支流甚至逆流的地位。美国的确比较特别，相对来说，它在现代世界、包括欧洲日趋理性化，脱离宗教信仰的过程中却还保留了比较强固的信仰；在世界日趋平等福利的过程中却还保留了相当的独立自由，即也可以说保留了某种对现代性的拒斥。尽管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国家，但这种拒斥是不是还是不可能持久地阻挡主流的趋势，何况它内部的教育和媒体，内部的大多数知识和技术精英，尤其是大多数受了高等教育的年青人，也都还是赞同乃至拥抱这一大趋势？

许多知识精英的确也反对物欲，反对消费主义，尤其是反对资本，甚至也反对市场，他们认为这种“滔滔者天下皆是”的物质主义都是资本之罪，市场之过。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最根本的还是价值观在起作用，还是大众的欲望和动机在起作用，资本和市场只不过是能够最好地满足这种物欲动机的手段和工具，后面还有物欲之主。于是，当他们在不断追求平等福利的时候，只是使这种物欲更加强固，更加难于满足，使人们更加紧盯着物质，不断提升对物质的期望值。以这样一种方式去试图克服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无异于南辕北辙。

许多知识精英的一个希望是人们在物质生活条件得到充分满足之后会转向精神，这精神倒不一定就是宗教信仰，也可能是艺术，是人文精神。总之是能够显示人与其他缺乏精神意识、只知有物的动物有别的东西。许多知识甚至政治精英一直抱有这样的期望，他们认为，妨碍人们去追求精神的只是物质条件的限制，是匮乏和贫困。但要实现这一从主要是物质追求到主要是精神追求的根本转变，在一个多数支配的平等社会，还需要有两个假定：一是多数人的确会有这样的愿望；二是多数人也的确能有这样的能力。先说能力，近代以来一直是这样的思想占主流：即能力都是后天可培养出来的，多数精神创造的能力只是因为外在的物质和教育条件受到了限制，如果这些条件改变，他们就会焕发出极大的创造性，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愿望，因为，如果有这种愿望，即便不创造，也可以欣赏和赞许，从而形成一种对精神创造有利的社会气氛。但是，当物质条件大大改善之后，人们会转向精神吗？还是会不断地、进一步地要求更多更好的物质？或者说在物质条件给人们带来了越来越的闲暇时间之后，多数人还是会用这些时间来得到更多更新奇的享乐，而不会用这些时间来追求艺术、人文、信仰这些精神性的工作？[[36]](#endnote-36) 认为多数在物质条件大大改善，人们有了充分的闲暇之后，一定会具有转向精神的愿望和能力的这两个假定是太强了，并不足以得到对人性的经验观察的有力支持。

无论如何，世界进入近现代以来的长期主潮看来是朝向更多的平等、更多的福利的。在人类没有遇到大危机之前，这一点看来不会改变。正如托克维尔所言：在这个时代鼓励人们前进的主要激情，还是对平等的热爱。所以，平等在美国虽然会有起伏和短期的挫折，大概也不可能违背这一主潮太久。

我们从美国过去的走向似乎也可以看出一些未来的走向，即美国建国以后二百多年的历史潮流主要是走向越来越全面，乃至也越来越彻底的平等，虽然也会有一些反弹，但平等化是一个基本的趋势。平等获得的主要成果是不可撼动的，同时它还会继续往前走。达到身份的平等、宗教的平等、政治的平等和法律的平等之后，还有机会的平等，进而还有福利的平等、尊重的平等等等。已经赢得某一方面的平等的人们，还会进一步争取其他方面的平等。 平等绝不会止步不前，除非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大灾难。

从政党和总统的历史看，相对于杰弗逊的民主共和党来说，联邦党还不够民主和平等；而相对于杰克逊的民主党来说，杰弗逊的民主共和党也还不够民主和平等。杰弗逊比华盛顿更强调平等，他赢了老亚当斯；而杰克逊又比杰弗逊更强调平等，他赢了小亚当斯。而联邦党乃至杰弗逊创意的民主共和党都消失了。剩下的是杰克逊的民主党，还有后来创建的共和党，共和党那时代表着北方和进步，它在林肯总统的领导下终于废除了奴隶制度，也保住了联邦；再后的进步主义运动又进一步推动了平等；小罗斯福也比老罗斯福更强调平等，“新政”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而且在后一个罗斯福总统的带领下，民主党摆脱了在南方州的保守形象，夺得了“自由”的话语权。60年代的民权运动又进一步推动了平等，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方案更强调“结果的平等”。过去的古典“自由派”现在只能算是保守派了。在美国数百年静悄悄的“革命”历程中，看来基本都是更偏向平等的政党和领袖后来居上，成为新的主流。

而当今美国政治的遗产——无论是思想还是制度——也主要是来自左翼的，即便偏右的政党和政治家上台，他们上来为稳定计，也往往要继承此前的一些左翼遗产，遵循新的“中道”。艾森豪威尔试图超越意识形态的冲突、维护新政；尼克松的国内政策其实也还是相当支持福利权，乃至包括肯定行动的；小布什信仰虔诚，态度保守，但在社会福利方面也提出一种“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政策，导致其政府开支仍增加不少而引起茶党的抨击。体制内的政治家往往还是会往中间靠。右翼群众的愿望从体制政治家那里得不到满足，往往就诉诸体制外的，但也往往比较极端的人物。而右翼如果得非其人，只会继续遭受重创。加上左翼媒体和舆论的优势，右派的“遗产”就常常变得“臭名昭著”。美国在不断进步。按照今天的“政治正确”，至少小罗斯福之前的几乎所有总统都程度不同地是有些“政治不正确的”。不仅现实主义的老罗斯福被抨击，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威尔逊也遭到指责。按照更激进的、批判的“人民史学”的观点，不仅华盛顿、杰弗逊难逃批评，甚至对林肯也颇有微辞。

所以说，从美国过去历史的趋势看，基本可以说是偏左的。社会政治无疑是朝着愈加平等的方向演变的。追求平等也往往就意味着追求“进步”，而保守自由则的确成了“保守”甚至“反动”。虽然比较剧烈的反弹也不是没有，但它往往是采取或者比较戏剧化、甚至闹剧化的形式，或者采取比较极端和激烈的民间方式（这也是因为比较绝望？），这样，每一次反弹往往最终都陷入“退一步，进两步”的状态。当然，美国的左右两翼可以说基本还是守住了底线，即不破坏基本的宪政和法治。美国几乎没有极右和极左，基本还是走中间偏左的道路。

从近代以来世界与美国发展的长远趋势来看，今后美国大概还会以走这样一条中间偏左的道路为主，虽然会有间断和回潮，但这样一种主流大概不可改变。虽然我们也借助韦伯和托克维尔描述了一种人类世界可能过度平等化和工具理性化的前景，但美国独立之初就楬橥的所有人都应该是平等的，都应该得到平等的对待，都可以追求自己所理解的幸福的信念毕竟具有一种道德的正当性。虽然由于人性的差异，这种追求又可能陷入某种困境，而这一困境不仅是美国的困境，也是世界的困境，人类的困境。

美国已经是够特殊了。它甚至有点像是现代世界中的“异类”，借助于新大陆的特殊环境和最初定居者的特殊信仰和经验，和率先进入现代的欧洲相比，它在平等化中更强调独立自由、自我依靠；[[37]](#endnote-37) 在理性化中仍然保持某种范围内的信仰精神的热情。[[38]](#endnote-38) 从这方面说，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现代化国家似乎还在顽强地抵制更加全面和彻底的现代化。这真像是一个大的悖论。

然而，美国可能本身就是一个内部存在着许多矛盾和悖论的国度。它那么坦率地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物质主义和个人发财致富的愿望，却又不时兴起一种信仰的热望与虔诚，以及持续慷慨的个人慈善；它那么大手大脚地浪费资源，盛行消费主义，却又有那么勤勉奋斗的工作伦理；它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也不乏文质彬彬的礼仪，但也不时透露出相当强烈的原始野性和蛮劲；它以一个观念立国[[39]](#endnote-39)、严守宪法、法律条文，却又相当实用主义和注重实际，拒绝各种乌托邦的冲动；它在世界上常常表现得霸道、单边主义，但又不时表现出孤立主义，想退回到自家一隅。当年托克维尔预见过俄罗斯的崛起及与美国的争霸，今天谁能预见美国未来的命运？

1. 如方纳指出的，“所有人被创造为是平等的”，这“实际上是宣示了一个颇为激进的原则，当时没有人能够预测它所包含的全部涵义。”见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1页。19世纪主张废奴的人们以其中的平等原则为依据；而主张保留的人们如兰道尔夫则说《独立宣言》是“最危险有害的假货”；卡尔霍恩说《独立宣言》中的平等观念是“虚假的教条”，只具有“虚伪的真实性”，是被“毫无必要地塞进《独立宣言》”的。参见程映虹“被遗忘的历史：美国当年如何为奴隶制辩护”，《经济观察报》，2016年12月25日。双方倒是有一点相同：即都认为“平等”还不是真实的，差别乃至等级才是事实，但一方要固化差别，另一方则要实现平等。　 [↑](#endnote-ref-1)
2. 伍德著，《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endnote-ref-2)
3. 同上。 [↑](#endnote-ref-3)
4. 伍德著，《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endnote-ref-4)
5. 《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第239页。 [↑](#endnote-ref-5)
6. 《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第11页。 [↑](#endnote-ref-6)
7. 白人契约奴，或者也被称为“契约工”，他们往往是购买不起船票而订立这种换工契约的，他们也没有选择自己职业和劳动的自由，但可以在一定的契约年限之后获得这种自由，但在当时的严酷环境中和压迫下，许多人往往等不到这一天就死去了。这样的契约奴早期并不少，比如在1671年的时候，弗吉尼亚的白人契约奴是黑人奴隶的三倍。也有一些黑人契约奴得到释放，另外，如果是从非洲抢掠而来，而不是从非洲酋长购买而来的黑奴，这种行径也会遭到抵制。 [↑](#endnote-ref-7)
8. 福格尔著《第四次大觉醒及平等主义的未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4页。 [↑](#endnote-ref-8)
9. 参见《卡尔霍恩文集》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19页、631页。 [↑](#endnote-ref-9)
10. 《第四次大觉醒及平等主义的未来》，第145页。福格尔在他1974 年出版的《十字架上的岁月：美国黑奴经济学》，1989 年出版的《未经同意或契约：美国奴隶制度的兴衰》中，根据南方种植园档案和家庭帐本、商业记录等原始经济资料，运用计算机统计和分析，得出了他自己都难以置信的数据。比如说不仅大多数黑人奴隶都是以独门独户的家庭居住，有各种奖金，休假和年终奖，他们也营养良好，比如在 1860 年，黑奴年度人均肉类消费量是 179 磅，这一水平甚至高于美国人在 1964 年的平均水平。当然，他们的劳动也很繁重。 [↑](#endnote-ref-10)
11. 《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endnote-ref-11)
12. 《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第236页。 [↑](#endnote-ref-12)
13. 当然这是就主要冲突而言，还有其他的价值冲突，比如对持枪权的争议反映的可能就是独立自由与生存安全之间的矛盾。参见塔塔洛维奇与戴恩斯所编《美国政治中的道德争论》， 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 [↑](#endnote-ref-13)
14. 即他们认为真正失去劳动能力的人只是很少数，这些人的确需要照顾，但许多拿福利的人其实只是不想工作，参见马格尼特著，《梦想与梦魇——六十年代给下层阶级留下的遗产》，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其中以黑人青年为例，1991年，20-24岁的黑人男子除了参军、坐牢之外，只有59.5%的人工作；18-19岁工作的还不到三分之一。许多黑人女孩未婚生育，或者是单亲家庭，且生育好几个孩子，因为给孩子的福利较高，结果孩子代替了丈夫“养家”的角色。第13、34页。 [↑](#endnote-ref-14)
15. 保守派在爱国家与恨政府之间似乎存在矛盾：他们爱国，希望美国强大，但这强大的国家的目的主要是保障他们的自由和独立，剩下的事情、如何追求和保障自己的幸福或福利就主要由他们自己来干了。故而准确地说，或许是他们希望美国对国外来说是最强国，但对国内来说是弱政府——当然，这弱是指国家的经济分配功能，而不是指国家维持法律与秩序的功能。 [↑](#endnote-ref-15)
16. 比如被指对保守派有很大影响、甚至是他们“灵魂中的女人”的兰德，其影响对经济自由主义者的确巨大，但对社会保守主义者来说却远非如此。兰德更像是一个自由至上的个人主义者。她反对传统信仰和各种有神论，乃至也反对康德的义务理论。她的影响虽然很大，但只是单方面的。 [↑](#endnote-ref-16)
17. 在共和党方面，可能赞成传统信义的人许多也会赞成减少国家开支，但主张减税的人们却可能没有那么多人会赞成传统信义。 [↑](#endnote-ref-17)
18. 当然比起两大党来其实小多了，所以许多人还是只能在两大党之间选择。 [↑](#endnote-ref-18)
19. 据我认识的一个该党成员介绍，她认为该党主要是一个精英党，甚至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精英党。要了解该党的政纲可以参见网上的“诺兰曲线”，“世界上最小的政治测验”等。中国一位知识分子邵建曾有一文“公域向右私域向左”，其中表述的自己的观点就颇接近于这一立场。 [↑](#endnote-ref-19)
20. 自由至上党或可视作是“中间的极端”，即将这一谱系不是理解为一条直线，而是一个三角形。 [↑](#endnote-ref-20)
21. 比如胡佛总统就称自己为“自由主义者”。 [↑](#endnote-ref-21)
22. 往往是来自街头运动的质问式的表达,也比较情绪化。 [↑](#endnote-ref-22)
23. 据2016年4月22日美国劳工统计局资料显示：2015年全美共有8141万家庭，全家无人工作的家庭有1606万，比率高达19.7%，这意味着美国每五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没有人工作；全美超过一亿人口依靠各种福利过日子。又2016年5月9日华府智库移民研究中心（CIS）公布一份移民花费报告，指出户长为合法或无证移民的家庭，每年平均享有联邦福利6241元，户长为“美国出生”（native）的家庭享受的联邦福利为4431元，前者比后者高出41%。享受最多联邦福利者为墨西哥和中美洲移民家庭，他们获得纳税人付费的联邦福利，每年平均达8251元，超过土生土长美国人家庭86%。转引自何清涟文：“美国大选缘何引发世界焦虑？”见：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165f673ea0102wi6a.html [↑](#endnote-ref-23)
24. 据米克尔斯韦特与伍尔德里奇合著《右派国家》提供的数据，美国的不平等在近数十年里加剧了：在1970年，0.01%的最富有的纳税人，收入占全国收入的0.7%；但在1998年，0.01%的最富有者的这一收入占比超过了3%；这意味着最富有的1.3万个家庭的收入等于2000万个最贫穷家庭的总收入。如果按资产而非收入来看，则1%的最富有家庭控制了美国38%的财富，是底层80%家庭的两倍。又1960年，美国首席执行官的平均薪资是工人平均工资的40倍，今天这一比例扩大到了超过400倍。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84-285页。 [↑](#endnote-ref-24)
25. 这一私人慈善的风尚与传统信义有关，它直到今天也相当强大，超过欧洲人：美国人拿出了占国民收入1%的收入用于慈善捐款，欧洲人则只有0.2%-0,8%。许多富人认为带着巨额的遗产死去是可耻的，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独立自助、一代代重新开创自己的事业，自己证明自己的能力。 [↑](#endnote-ref-25)
26. 这其中有同情心，但也掺有党派的利益考虑，据说罗斯福的高级顾问霍普金斯认为民主党已经找到了长胜不衰的万应良方，那就是：“纳税、纳税，花钱、花钱，然后选举、选举。” [↑](#endnote-ref-26)
27. 转引自安德森著，《美国平权运动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115页。 [↑](#endnote-ref-27)
28. 参见[曼彻斯特](http://www.dangdang.com/author/%C2%FC%B3%B9%CB%B9%CC%D8_1)著，《光荣与梦想》，[中信出版社](http://www.dangdang.com/publish/%D6%D0%D0%C5%B3%F6%B0%E6%C9%E7_1)2015年版，第1004页：一些人试图用古希腊罗马也出现过这样的年青人的放纵为他们辩护，但正如格雷斯•赫钦格（Grace Hechinger）和弗雷德•赫钦格（Fred M. Hechinger）反驳说，真正的问题应该是：“希腊后来怎样了？罗马后来又怎样了？或者，任何由自我约束转变成自我放纵的文化后来都怎样了？” [↑](#endnote-ref-28)
29. 个人选择自由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即平等尊重或承认政治的角度。可参见[波尔](http://search.dangdang.com/search.aspx?catalog=01&key2=波尔)《美国平等的历程》（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中对六种平等的划分： (1)政治平等。 (2)法律面前的平等。 (3)宗教平等。 (4)机会平等。 (5)性别平等。 (6)最后是所有事情都包含的受尊重的平等(equality of esteem)。他认为他所说的“equality of esteem “和德沃金所说的“受尊敬的平等”(equality of respect)有着细微的差别，因为尊敬(respect)更多的是一种赢得的东西。 [↑](#endnote-ref-29)
30. 米克尔斯韦特与伍尔德里奇合著：《右派国家》，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18页。 [↑](#endnote-ref-30)
31. 奥地利“新媒体”网站2016年11月22日刊登美国与拉美问题专家康斯坦丁·布洛欣的文章“美国对欧亚大陆影响力大减的根源是什么？”，文中写到：“根据2010年的人口统计，美国白人最迟到2041年将成为少数族裔，到2050年他们在美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将仅剩46%，从人口组成来看，美国将变成一个‘第三世界’国家：4.35亿美国人口中有54%是来自亚非拉的移民。”见2016-11-25 《参考消息》：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2016/1125/1461917.shtml [↑](#endnote-ref-31)
32. 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2-143页。 [↑](#endnote-ref-32)
33. 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3页。 [↑](#endnote-ref-33)
34. 以上分别参见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全书的“绪论”和结尾：“第八章 主题的总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endnote-ref-34)
35. 比如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不仅居于支配地位的儒家，甚至释道两家的思想也都是主张节制和淡化物欲的。 [↑](#endnote-ref-35)
36. 《人类简史》的作者赫拉利最近推出了一本新著《未来简史》，他在其中认为，人类已经基本控制住了饥馑、瘟疫甚至战争，现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几乎没有人会真正饿死，肥胖致死的人数是营养不良致死的人数的三倍。人的平均寿命在20世纪从40岁增加到了70岁，现在也还在往上增长。人类未来将追求什么呢？他预测的是人们将追求身体的尽可能长生不老，是生理和心理层面的各种快乐。参见该书第一章“人类的新议题”，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 [↑](#endnote-ref-36)
37. 史学家维贝在研究美国历史中注意到：“使美国人聚合到一起的是美国人分开生活的能力，社会的基础是分隔。”换言之，这是一个独立意识和社会意识都很强的社会。参见《右派国家》，第356页。 [↑](#endnote-ref-37)
38. 见《右派国家》第287页：美国有95%的人信仰上帝，超过75%的人属于某个教会，40%的人会每周上一次教堂。迄今还没有一个无神论者当选总统。 [↑](#endnote-ref-38)
39. 见上篇所引白修德语，观念即指《独立宣言》中的一组价值观念。 [↑](#endnote-ref-39)